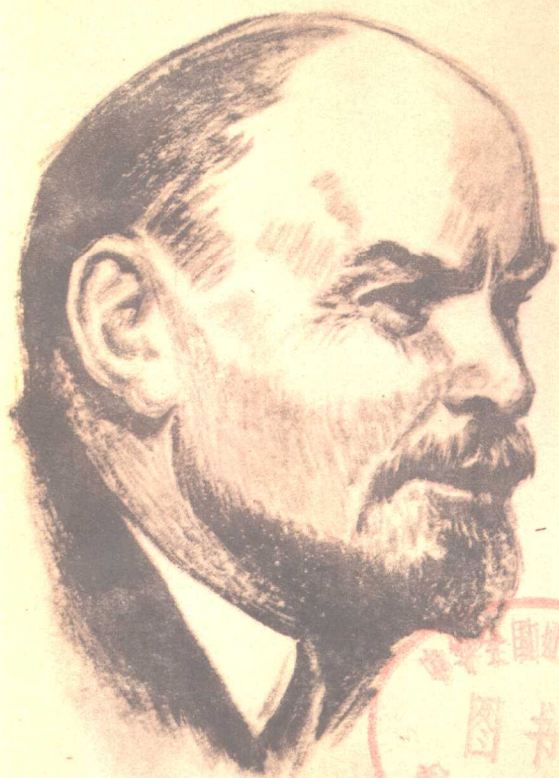


LIENING — RENMINDEGONGPU



列宁—— 人民的公仆

院图书馆

河北人民出版社

A73
4
Z

列宁——人民的公仆

褚瑞耕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石家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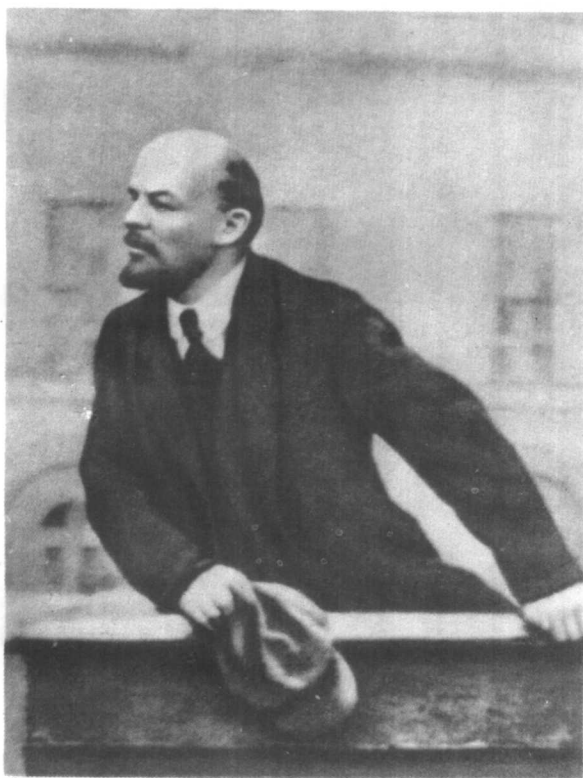
列宁——人民的公仆

潘瑞耕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4 1/2 印张 69,000字 印数：1—5,700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86·854 定价：0.42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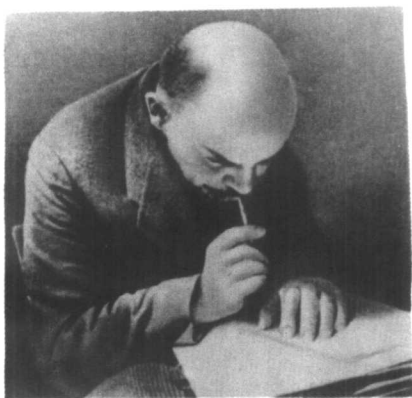
列宁 19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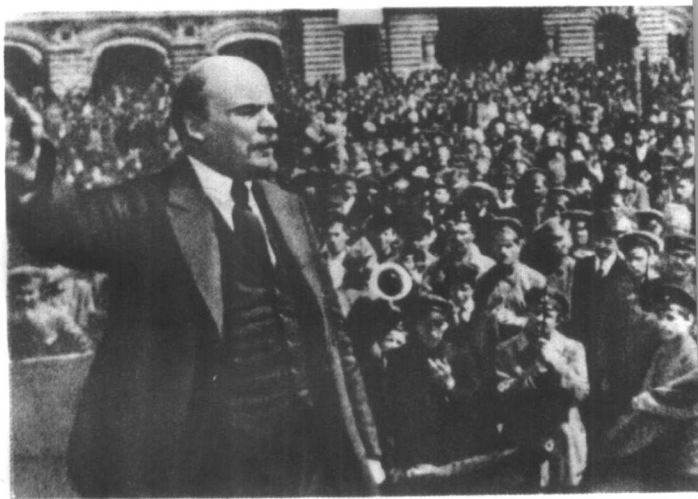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在莫斯科省沃洛柯拉
姆斯克县卡希诺村的农民中间（19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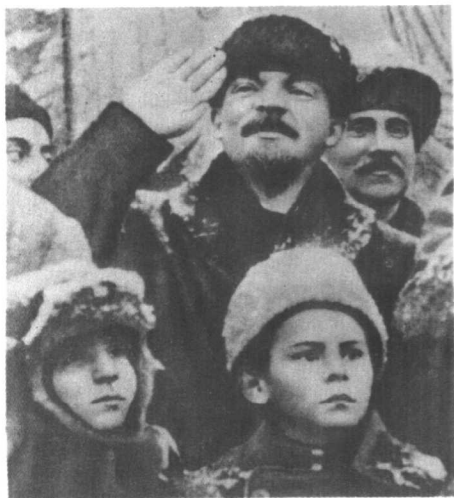
列宁（1919年）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列宁坐在主席团席位上记录发言人的发言（1921年）



列宁在红场向受普遍军训的部队讲话（1919年）



1919年11月
7日列宁
在红场上



列宁（1918年）

前 言

当一八七一年英勇的巴黎工人阶级以开天辟地的创举精神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工人政权——巴黎公社的时候，马克思就曾科学地总结了她的宝贵经验，其中提出了一个至为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6页）其后，恩格斯补充这一思想说：无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之后，必须“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5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部重要著作中又进一步指出：所谓防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也就是要“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66页）“我们要学习公社社员的革命勇气，要看到他们的实际办法就是具有实际迫切意义并能立刻实现的那些措施的一个轮廓，如果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我们就能彻底破

坏官僚制。”（同上书第 273 页）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理论上提出了“社会公仆”亦即“人民公仆”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建设的原则问题，那么，对此作了理论发展、尤其是进行了这方面巨大实践的一个人便是列宁。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杰出领袖，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任元首。他光辉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给无产阶级的政党，给一切共产党人、革命志士，给一切人民权力的执掌者，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遗产。

编写《列宁——人民的公仆》这本小册子，目的在于反映在俄共（布）执掌了国家政权之后，在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历史时期中，列宁是怎样言传身教，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怎样反对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是怎样模范地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和法律；是怎样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怎样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总之，是怎样作为一个“人民的公仆”而生活、学习和工作的。

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时代，同列宁当时是大不相同了。列宁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和身份，同

我们广大的党员和干部也不尽相同。但是，他所怀抱的宏图理想，他关于做人民公仆的理论，他在这一重要方面的实践活动的原则意义，是永放光芒、普遍适用的。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向四个现代化奋进的艰苦历程之中，我们广大共产党员和党政干部，都应向列宁学习，做列宁式的共产党员，做列宁式的革命干部，做列宁式的人民公仆。这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大家都来争做列宁式的公仆，我们的党就一定会更加有力量，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队伍就一定会更加纯洁、更加壮大，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无往而不胜。

编 者

一九八一年二月

一、生活在稠人广众之中

如果说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的长时间的革命斗争里，就已经反映出他作为人民公仆的优秀品质的话，那么在一九一七年俄共（布）成为执政党之后，他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深刻地了解群众生活，懂得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愿望。他无愧于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罕见的深信人民的创造力、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有着密切联系、并且获得他们无限信任和支持的国家领导人。

作为人民的公仆，列宁始终坚持“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他曾经写道：

“要生活在稠人广众之中。
要知道他们的感情。
要知道一切。
要了解群众。
要善于接近群众。
要取得他们的绝对信任。”

领导者不脱离被领导的群众，
先锋队不脱离整个劳动大军。”

这是他对全党的号召，更是他自己实践的写照。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事事走群众路线；他广泛接触群众，敏锐发现、热情支持群众中的新事物；他热情对待、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他还坚持深入民间 到实际生活中作调查研究。

机关与劳动者

列宁非常重视要使每一个对某个机关有要求、申诉或声明的公民，都能不受限制地自由出入该机关，各机关应该保证正确地对待和解决来访者的问题。

列宁写道：“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张贴关于接待群众来访的日期和时间的规定，不仅贴在屋里，而且贴在人人可以看到的大门外面。接待室必须设在可以自由出入、根本不需要什么出入证的地方。”“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有登记簿，把来访者的姓名、意见要点和问题性质最简要地记下来。”并且强调说：“星期日和假日也要规定接待时间。”

列宁认为，在管理苏维埃机关方面，实施这样的规定，对于反对拖拉作风、揭发舞弊行为以及揭露和清除混入苏维埃机关的不诚实的工作人员，都有很大的意义。

列宁责成秘书处的的工作人员给他读所有的信件，报告所有的控诉书。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列宁在给人民委员会总务处的一项特别命令中，责成凡向他报告的所有控诉书：一切书面的控诉材料应在收到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向他报告；口头的控诉材料应在四十八小时内向他报告。他还要求对于他处理控诉书的批示的执行情况，认真地进行监督。

后来，根据列宁的指示，在克里姆林宫外面设立了人民委员会的接待室，凡寄给人民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一切信件，都送交这个接待室。人民委员会接待室的秘书一定要认真处理这些信件，每两周要向列宁报告一次处理结果。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列宁了解到：人民委员会接待室寄给各中央苏维埃机关领导人员并请他们处理的劳动人民的控诉书，往往得不到回答和执行。列宁立即写信给各中央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员，信中说：“我命令你们立即行动起来。苏维埃行政机关的工作应该是适时、实在和迅速的。这种松弛现象，不仅使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且

使全部管理工作都具有了一种虚假的、空幻的性质。”

列宁要求各苏维埃机关领导人员要尽快地和最详尽地答复人民委员会接待室所提出的一切事情和询问，并警告说：对于任何拖延现象，“人民委员会接待室都有权将当事人送交法院追究责任，而不问其‘等级’如何！”

列宁以身作则，为改革机关作风、更加密切机关与劳动者之间的联系，他常常直接会见来访者。

一九二二年年底，列宁两次发病，身体极为虚弱。为了照顾列宁的健康，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一位副主席阿·伊·李可夫曾建议：列宁亲自接见的来访者，一般要由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或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秘书事先选定。

列宁针对这个建议，写信给三位副主席，明确表示：“我根本不同意李可夫的实际补充，并提出与他直接相反的意见——接见应当充分自由，不加限制，甚至扩大范围。”

来访者免受阻留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最初阶段，凡是到

克里姆林宫去会见列宁的人，都要通过很多的岗哨——克里姆林宫“入门处的岗哨”、“楼下的岗哨”、“楼上的岗哨。”访问者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会受到阻留。

列宁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明确要求卫戍司令规定这样一项制度：来访者如果有秘书处放行的指示，可以不必浪费多余的时间。秘书一定要注意来访者是否受到阻留。如果来访者没有按时来到，列宁就总要派人去查询：是来访者在克里姆林宫寻找通往人民委员会的通路呢，还是又被某一岗哨给阻留了？

列宁在给卫戍司令的书面指令中警告说，如果这一制度不能妥善地安排好，他就要采取强制的手段。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列宁在写给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的信中说：“昨晚八点钟，奥西波·彼得罗维奇·高尔登堡曾到我这里来。虽然，至少在半小时以前就预先通知过卫戍司令部和哨兵，可是他仍然在人民委员会的楼上（不是在楼下）受到了阻留。”“我再一次，——这早已不是第一次了——请你们注意这种违反制度的事情。不要迫使我采取严厉的手段”。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列宁再一次就哨兵阻拦去访问他的一些人而写信给克里姆林宫

卫戍司令部说：“我已不止一次地要求过克里姆林宫的卫戍司令，现在再一次要求你们规定这样一项制度，即凡是到我这里来的人，即使没有任何通行证，也有可能不经丝毫留难地，在克里姆林宫的大门或人民委员会的入门处同我的秘书处或三楼电话交换台的电话员取得电话联系。”“我现在对您提出警告，您对我的要求未认真执行。”

之后，列宁对应该如何组织这一工作，又做了详尽的指示。

“农民气压表”

在列宁看来，知道普通工人和农民的意见，了解他们的情绪，同知道中央委员、人民委员的意见，是同样重要的。

列宁在超乎常人地忙于最重要的国家事务和党的工作的同时，总要抽出时间来，和农民代表、农村工作人员、《农民报》的编辑谈话。他很重视农民写给报纸的信。他说过：“要知道，这是真正的人的文件！要知道，这是我在任何一个报告中都听不到的！”

《贫农报》主编卡尔宾斯基去见列宁，列宁常用这样的话开始同他交谈——

“喂，我们的‘农民气压表’显示了什么？”

列宁把《贫农报》叫做“农民气压表”，每次，他都长时间细心地听取卡尔宾斯基汇报：农民怎样生活？农民有什么疾苦？

一九二〇年底到一九二一年初的那个冬天，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劳动人民的牺牲和贫困达到了极点。农村经济空前衰落，惊慌和动荡笼罩着农民群众。最坚强的、最先进的农民也怀疑起来了。《贫农报》收到了许多农村的诉苦信和抗议信，编辑部曾选择了其中一封攻击苏维埃政权最厉害的信登了出来。于是，为苏维埃政权辩护的信便如雪片似地飞到编辑部，因此，报纸上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论。

列宁为此同报纸负责人进行了一次时间特别长的交谈，他让报社作出详细的书面报告，并要附上农民来信的摘要。

报社挑选了五十多封关于余粮收集制和农民艰苦生活的来信，研究后写成报告送到列宁那儿。后来，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改变农村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其中好多地方是用农民的信作为材料的。

列宁要求《贫农报》编辑部根据农民来信定期作报告。他曾写过有关的这样一封信：